

人工智能与青年价值观塑造： 机制、话语、风险与应对

■ 陈文旭 温煜明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的新技术,其过程赋能与信息互联特性使得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呈现新样态,即从“单一场域”向“复合场域”转型。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通过收集、分析和挖掘有关青年群体的信息与数据,进而对青年价值观塑造产生多维影响。青年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过程会受到人工智能技术逻辑与话语权力影响。人工智能嵌入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引发了深刻变革,也带来了潜在风险,须以防治并进的观念有效应对。

【关键词】人工智能 青年价值观 话语权力 技术 传播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2.003

1956年,“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在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术语,认为人工智能就是让机器所产生的行为表现出人所具有的智能行为特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把“智能”理解为“智”与“能”的总称,两者为互相独立的部分;在西方词源中,“智能”最早的意涵即“理解能力”。根据此初始含义,法国学者费尔南多·伊弗雷特(Fernando Iafrate)将“智能”定义为理解事物和事实的智力水平,并且可以通过发现它们直接的关系而得到一种合理的知识性解释^[1]。2018年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中指出,“人工智能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2]。本文使用的“人工智能”概念采用《白皮书》中的定义,从本质上看,人工智能把人的部分智能活动机器化,让机器具有完成某种复杂目标的能力;人工智能是对人脑组织结构与思维运行机制的模仿,是人类智能的物化,是主体意志的实现。

收稿日期:2024-01-16

作者简介:陈文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社会思潮;
温煜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世纪资本主义四大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与理论批判研究”(课题编号:19BKS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6.4%^[3]。与此同时,互联网网络体系快速壮大,平台体系逐步完善。在技术变迁和社会变迁的双重驱动下,有关青年价值观的各类信息加速生产并在技术赋权和社会赋权加持下趋于智能化,其传播形态日益多样化,依托人工智能所拓展的各类信息应用场景展开新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4]人工智能赋能社会各领域创新发展,是引领未来社会全方位变革的战略技术。人工智能给世界带来了颠覆性影响,为生产力进一步提升注入了新动力,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及思想传播方式。正因如此,人工智能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内嵌于社会生活领域及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技术赋权和技术赋能效应愈加凸显,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在新技术加持下出现了崭新样态。人工智能兼具创新性与破坏性的双重特点^[5],这一革命性技术如若利用不当,会对青年价值观培育工作产生负面效应,因此需要在理论上厘清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机制及影响。

一、机制:人工智能塑造青年价值观的技术逻辑

青年价值观主要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社交网络信息的双重作用影响。“社会场景越来越由电子媒介交流所组成”^[6]。作为技术工具的人工智能改变了青年价值观塑造机制。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要素数据、算法和算力成为参与青年价值观塑造的关键因素。价值观数据为人工智能发挥作用奠定基础,算法促进数据转变为具体知识或生产力,算力保证人工智能有效地处理、计算和输出价值观信息。这就是人工智能参与青年价值观塑造的技术底层逻辑,这一过程借助互联网、分布式储存、大数据分析、云计算、虚拟现实、数据可视化系统等技术具体展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使用互联网来获取信息、进行交流和分享。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指出:“程序产业,在每一天,尤其是通过大众化的程序推送,生产了大量的‘人工群众’(artificial crowd)。”^[7]互联网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8]互联网是各种信息渗透并影响青年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基于互联网媒介,信息传播主体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对青年价值观的塑造、影响和引导。传统的价值观传播途径包括课堂教育、板报宣传、电视媒体等,而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智慧算法、数据分析、万物互联等技术手段实现对青年价值观相关信息的智能化分析和推荐。具体而言,通过搜索引擎的话题设置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热点推荐,信息传播者利用人工智能的智慧分析,精准地向青年群体推送兴趣耦合的新闻、文章、视频等内容,从而影响青年价值观的塑造。

人工智能通过分布式储存技术整合信息和提高算力。具体而言,基于获取来自存储中分散的裂片信息,通过对这些价值观微端信息的整合重构,分析其孤立点、密集点及关键节点,促进人工智能建构青年的社会关系网络并理顺关联影响要素。现象与现象、数据与数

据间的并行连接,能够减少数据传输损耗以提高分析准确度和计算能力,增强价值观信息的传播效率。

通过智能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手段,人工智能的精准定位和动态传播,使得跨平台信息推送得以实现,从而青年价值观塑造与传播过程表现为信息的数据化和可视化集合。人工智能嵌入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的动态逻辑表现在对青年行为模式的总结和对人机交互海量数据的分析,通过对青年使用互联网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信息进行挖掘和分析,建立网状链接模型,立体化地描绘并呈现青年群体及个体的行为模式和选择偏好,进而对青年价值观塑造产生影响。结合人工智能自身存储与计算能力,青年价值观的数据信息得以有机整合,通过计算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构建青年价值观的整体视图,根据已有数据集评估影响因素并有效关联不同信息,构建走势预估图使人工智能对青年价值观能够跨层次、跨群体透析。

云计算和大数据为相关主体利用人工智能分析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这些承载平台可以存储和分析大量数据,挖掘青年价值观数据间的关联逻辑和适配程度,洞察其社会关系的复杂机理。“通过移动互联网渠道,社交媒体用户保持了较高水平的互动黏性。”^[9]通过对信息关联逻辑的洞察和对青年个性化选择的认识,人工智能可以更深入地领会青年的内在需求与心理动机,诸如通过分析青年的兴趣爱好、阅读习惯等信息,针对青年用户推送多样的适配内容,更加精准地传递价值观相关信息。

虚拟现实技术在青年价值观塑造方面的影响源于沉浸式虚拟体验,强化了多元信息的共享。青年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身临其境地参与各种虚拟场景和情境。“新兴虚拟现实技术使参与者处于一个身临其境、具有完善交互能力,同时能够启发构思的信息环境中。”^[10]虚拟现实技术为青年带来多样化虚拟体验,并引导他们在虚拟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探索。在现实与虚拟共存的“二元世界”中,青年可以利用虚实交汇的网络时空体验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实践场景,突破对具象世界中单一切面静止的、孤立的感知,促进青年以立体化、动态化的认知方式参与世界和认识世界。“虚拟在场”的沉浸感是可触知觉中的具身体验。这种深度互动体验间接影响青年的感知和认知,使青年从具象世界的亲历者变成了全能客观的“观察者”,立体多维的虚拟世界塑造了青年对不同情境、观念、态度和价值观的认知。例如,通过模拟虚拟社会场景或冲突情境,人工智能可以引导青年思考并体验各种伦理和道德选择,从而对其价值观塑造产生影响。

信息传播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预测青年价值观的未来发展趋向。大数据可视化系统通过视觉化方式展示和分析大数据,借由图像处理、立体建模等功能,用户主体可以直观、准确地捕捉数据内涵及其变化规律。“数据可视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图形化方法清晰、有效地表达信息”^[11],大数据可视化系统对收集的各类信息进行自动分类、聚类分析和倾向预测,能够直观地展现青年群体思想关系网络及群体内部的分歧节点和统一节点。信息的在线呈现方式直接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12],经由可视化系统的智能传播将图像指征、表达方式、语言风格与群体特征联系起来,处理得出不同社会要素在青年价值观塑造与传播中的影响程度。同时,通过对已收集信息进行视觉化交互呈现,形式上也会更加丰富、直观、立体。

人工智能通过信息分析系统探视青年价值观的主要焦点。人工智能能够基于信息集合对青年的关注焦点进行针对性处理,利用大数据信息分析系统对青年的浏览和检索内容进行实时采集,分析话题出现频率、变化趋势等。基于此,信息传播者利用人工智能识别青年关注焦点及其演变轨迹,绘制青年群体内部的分裂线及聚合点,进而综合各社会议题及环境要素,挖掘数据逻辑并最终形成分析简报和多维模型等可视化结果,深刻透析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

青年价值观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技术要素是塑造青年价值观的重要媒介。“通过传播技术配置所产生的对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的影响……这些技术配置归纳出我们建构现实的方式的‘环境’。”^[13]在智能技术支持下,人工智能可以将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着的和尚未发生的事件都纳入分析图谱内进行处理、应对、预测。信息传播主体利用人工智能,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媒介进行技术收集、分析和挖掘有关青年的各种信息,通过考察诸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及其历史演变,并通过相应技术手段进行立体化的解析呈现,从而对青年价值观塑造产生精准影响。正如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评论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时所言:“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策划好了的和正在策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去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14]人机互动中人工智能逐渐褪去单一的技术外壳,成为一种事实上的话语权力。

二、话语:人工智能塑造青年价值观的承担介质

人工智能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是通过话语机制嵌入和赋能来实现的。“意识形态之争,体现为意义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就是为以利益—权力为基准的意义之间的斗争,这是一个意义的战场。”^[15]在网络世界中,不同主张的话语权相互竞争。主流媒体立足经济和政治基础占据传媒主导权,通过主动塑造、积极表达和传递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影响青年价值观的形成。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的话语权力要素,通过应用数据和算法改变了传统的话语传播方式。因此,考察人工智能塑造青年价值观的过程必须探究二者的内在权力机制。人工智能话语权力基础来自于技术对现实生活的反作用,具体表现为技术的广泛性和强渗透性。人工智能在接收、处理、运行与青年价值观相关的数据信息时,实质上反映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主体的偏好与倾向。就传播内容而言,作为智慧技术的人工智能具有部分自主性,因而一定程度上会为价值观信息的生产与表达创造界限,这一界限事实上就成为了话语权力的表达,即通过技术理性参与青年价值观的信息挑选、建构和培育过程。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的青年价值观塑造与传播路径正在被网络虚拟时空下的新传播形态加速重构。数据与算法成为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中新的话语生产要素,技术的发展使得权力的流动更加灵活和频繁。

话语主体因其主导地位和优势资源能够影响客体,使客体处于受动、追随地位。“话语总

是负载着主体的意志和诉求,表达主体的情感思想,通过具有说服力、引导力、感染力的形式作用于客体,以客体认同兑现主体的价值要求。”^[16]话语权是权利、资源、权力、能力与权威等因素的集结,与话语主体的主导地位、思维能力、参与意识、价值选择等多因素相关,不同话语主体基于智识技术能够传达其话语主张,进而影响话语客体的信息选择和参与环境。不同于传统媒介下主流话语的绝对主导,网络世界中的不同话语主体的话语主张彼此竞争,争相“蔓延”,主流话语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程度被部分消解,多元话语彼此竞进和争衡。马克思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7]。在网络世界中,人工智能推荐的并非是主流思想,而是信息过滤与筛选后的“信息茧房”。“算法的隐蔽性、高专业性和模糊性脱离了监管的范围,凭借着‘分类’‘筛选’‘优先’‘过滤’等模式塑造了个人在互联网上的感知,主导了建构受众感知的权力,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强制力量。”^[18]人工智能的话语权力基于市场逻辑而非管理逻辑起作用,它根据青年价值观需求的市场逻辑进行资源分配与内容推送,而非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所以人工智能的话语权力具有选择偏好,并且技术理性大于价值理性。

话语权威、效力都是外在制度和权力的折射。权力及其支配关系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学者从权力的社会属性角度对话语进行了研究。“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19]一旦技术突破了主体的掌控与运用,成为一种脱离主体独自发挥作用的“自在之物”又反过来对主体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技术就从一种经验逻辑的自然科学变成了具有社会属性的话语权力。基于“权力强化”背景,“智能技术将成为重要的权力元素,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社会组织,只要掌握了大量的数据等智能技术,其权力就会得到强化。”^[20]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与信息承载着新的话语权力,各个权力要素循着逻辑、情感向度朝着青年易于接受的价值观靠近,作为“工具”的技术具有了一定的主体性,技术置换权力机制得以开启。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信息传播,青年价值观塑造与传播中的旧的话语权力受到冲击,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得话语权力的流动更为灵活和频繁。公司、社会组织、团体等拥有了海量用户数据,基于智能技术他们在青年价值观塑造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强大的话语权力。这种话语权的加强使得相关主体能够对青年价值观产生更直接和立体的影响。在数字网络空间中,影响青年价值观的信息基于新的介质迅速传播,青年的思想发展也呈现多元化。人工智能通过信息过滤为青年设置标准,“主体臣服于‘标准’,随之成为算法的存在物。”^[21]算法比青年本身更理解青年的需要,基于“生理感知”的需求被算法认为是不准确的,基于“计算”得出的需求才被认为是真正的需求。虽然算法本身没有偏见,但是仅基于青年的网络数据计算出的结果却是有偏见的,它偏离了青年价值观塑造的真实需要,人工智能通过发挥话语权力介入青年思想塑造过程。同时,议题设置也成为人工智能塑造青年价值观的手段。设置议题会主动引导舆论,热榜推送使人们不得不关心某些热榜新闻,小圈层内的话语信息成为大范围的议题共识,舆论被引导与传播,“谁入局,谁出局;哪些内容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哪些内容注定无人问津……它将更多地由算法来完成。”^[22]

总之,人工智能绝非价值中立的技术手段,而是内容与主体勾连互通的权力中介。青年参与网络世界获取相关信息的过程,是受人工智能话语权力支配的过程。“算法权力是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人工智能算法在逻辑上是一种技术权力。”^[23]青年一方面搜索相关的价值观内容,主动建构起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被技术所影响,潜移默化接受技术传播的各类信息,“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4]。技术驱动与主体建构的二元对立是基于主客体关系的一对矛盾,两者的矛盾运动会使双方吸收有利因素,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

三、风险:人工智能塑造青年价值观的负面效应

随着技术嵌入社会生活各领域,人工智能对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的影响持续深化,这一过程既为青年价值观的正确塑造创造了条件,同时又带来了许多显性和隐性的风险。人工智能作为反映人的智慧的工具,其技术加持赋能和信息互联互通特性使得信息传播主体塑造青年价值观的过程呈现新样态,即从“单一场域”向“复合场域”的转型。随着新技术、新应用、新载体迅速发展,包括深度计算、虚拟现实和算法推荐在内的先进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基于网络传播的价值观相关信息展示出“海量聚集、裂变传播、差异推送”的特性,加剧了青年价值观风险管理的困难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信息主体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用使得价值观信息表现出高度定向性和精准性,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易使主客体双方之间的信息流动形成闭环的“信息泡沫”。信息泡沫会导致各方接触的信息更为偏蔽和同质,难以获得全面和整体的信息输入,这对青年形成独立和审慎思考能力构成潜在威胁。“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25]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构建起了宏大的信息传播场域,也以革命性方式创新了青年参与世界的途径方式,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正在被虚拟网络时空内的新传播范式加速重构。新的思想传播途径改变了与价值观相关的各类信息对青年价值观的思想渗透方式。“信息往往可以提供关键的权力资源,网络信息的传播使得权力资源将更加分散,传统官僚体制的垄断将结束,互联网时代的传播速度意味着政府对舆论的传播力和主导力都将下降。”^[26]这意味着,如果政府管理职能的弱化或监管的不到位,网络空间因人工智能的影响就更易成为多元价值和错误思想的交汇之地。在宽泛连通的数字网络空间中,价值观内容以新模式迅速传播,青年的思想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基于虚拟空间的新交往方式,加大了通过常规社会属性划分群体边界的难度,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边界正在被重塑。在人工智能时代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存在传统媒体传播力削弱、网络意见领袖林立、信息“把关人”角色淡化、部分青年囿于信息茧房等风险。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多元传播一定程度上侵占了主流媒体传播空间。在传统传播过程中,由政府主导的主流媒体负责信息把关和内容选择,并通过议题设置等方式为青年群体提

供信息,在塑造青年价值观过程中占绝对优势。人工智能赋能信息生产与流通过程打破了主流媒体和信息“把关人”对信息媒介和传播渠道的严格控制,传统的信息传播主体的话语权力被分散至智能机器和普通用户,主流媒体和专业把关人的主导权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同时掌握了部分话语权力的众多网络意见领袖争相表达观点,又进一步挤占主流价值观的传播空间,易催生社会价值迷失与价值失序的乱象。“在理性迷失的情况下,青年本有的理性反思与批判能力也会在这种个性化迎合中消磨殆尽。”^[27]“技术并不是中立的、价值无涉的,特别是当公共权力与技术相结合时会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28]人工智能消解了传统媒体与用户间单向传播的关系,青年用户对各类信息获取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同时海量信息也使得受众用户面临数据洪流下信息繁多、良莠不齐的选择困难。泛滥信息会令主流价值观和正面信息难以吸引青年的注意,甚至被一定程度边缘化。而青年用户点击率高的信息往往受“算法黑箱”偏爱,相关热点会被优先向青年推送,主流价值观内容可能会被算法限制传播。

信息过载和个性化推荐使青年更容易受到偏颇或片面信息的影响。信息传播主体利用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推荐系统,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然而这种个性化服务可能导致青年只能接触到符合其兴趣和偏好的信息,进而易形成信息孤岛和认知封闭局面。由于信息来源的狭窄性,青年可能无法接触到多样化的观点和价值观,容易陷入信息过滤和信息偏见的困境。此外,传播中的个性化推荐算法技术也可能加剧青年的消费主义倾向,使其更加追求物质享受和短期快乐而忽视长远目标和价值追求。长期沉迷于单一领域的内容而缺乏与外界的交互则可能使青年形成“自我确认性偏见”心理,错误地把单一观点当作“真理”,而忽视、拒绝和排斥多元信息,走向非理性主义。

人工智能的信息生产、智能计算、个性推荐特性为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设置了界限。基于个性化机制和网络多元信息,信息传播主体依托已有的青年数据信息,对其选择偏好的信息进行“定制”,在海量信息竞逐中夺取青年的“注意力”,价值观传播的公共标准下移,非主流价值观侵占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空间。人工智能因个性化机制也更为青年推送同质性信息,其结果是“个人极易沉浸在同一性和均质性信息的包围中,陷入相对封闭的社交链条。”^[29]“每个人将像蚕蛹一样将自己束缚在自我偏好的信息城堡之中,无法逾越出自己的偏爱和喜好。”^[30]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的内圈将会催生茧房效应,青年所接收的信息往往具有明显指向性甚至极端性,固化了青年的信息获取路径,最终导致青年认知出现严重窄化现象。与此同时,青年一旦沉溺于自己编织的“茧房”之中,就会被削弱主动搜索和向外获取其他信息的能力,忽略资讯信息的多样性。假设青年对主流价值观缺乏明确的选择倾向性,算法便会进一步自动过滤此类信息,破坏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全面性和广泛性。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31]人工智能是把双刃剑,智识科技的变革性表现在价值观信息获取途径多元与信息生产存量丰富等方面。同时,在全球化视域下,价值观传播的复杂性与跨地域性凸显。人工智能影响青年价值观的相关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网络信息传播方式打破了传统媒体话语控制的既有路径,智能平台的即时海量特征和易得性降低了价值观信息发布的难度与限制,弱化了传播壁垒。海量信息、多元价值观更多地会因算法推送迎合青年的

流量性新闻,进而形成集群效应。话语、准则、权力、领导权成为价值观这场“无硝烟战争”的重要要素。价值观风险信息的多元化传播,不仅使对青年价值观的监控和管理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而且预警和治理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对官方权威话语的祛魅、人工智能去中心化特质和基于青年用户的价值观画像而进行的智能推荐等共同导致主流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并竞共存局面。

智能技术的异化使青年在网络上越来越失去个体意志和个体自由。“数据寡头掌握人们的连接方式、接触方式和交往范围,加速利益和权力对事实的捏造,促进后真相的生成。”^[32]青年与人工智能的互动频次不断增加且程度不断加深,沉迷于虚拟化的智能场景将导致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体验被过滤和掩盖。虚拟感受部分取代了真实活动情感与认知,青年在人工智能建构的信息传播话语体系中越来越成为被动接收者,如果不加以控制,最终结果则会是个体意志的退场和个体自由的丧失。

四、应对:技术赋能与有效传播的善治之道

青年价值观的塑造工作要变被动为主动,就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使之成为治理杂乱信息的驱动力量,通过提高认知水平与强化解释能力,实现人工智能在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的有效嵌入。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须以防治并进的理念有效应对。

从技术运行的角度来看,需妥善处理技术异化,使技术成为助力青年价值观培育的良性动力。技术异化是指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它可能造成从主体需求和利益中脱离出去而转为对主体进行压迫的结果。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价值观相关内容的传播和扩散极为迅速,多元信息共生存在于同一信息场域,信息聚合增大了风险的不确定性。米歇尔·威尔森(Michele Willson)指出:“人工智能系统及算法并不能全然独立于人类,因为它们运算背后必定有人的输入。”^[33]第一,政府不仅要把握技术发展趋势,也要理解技术进步带来的革命性变革、潜在风险隐患以及对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影响等,需适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进行规范与调整,防范算法歧视、算法偏见现象的发生。人工智能必须有效嵌入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政府要通过改进技术应用途径,建立青年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的风险识别机制,加强辨识及理解风险的能力。政府要以人工智能为辅助工具深化对各类价值观信息的监控与管理,建立智能化等级识别判断系统,有针对性地制定青年价值观风险样态的分类、降低和转化方案,提升风险识别的效率和准确性。第二,主流价值观传播者要积极引导青年价值观的培育,推动人机良性互动进程。通过加强主流媒体传播者的实名认证机制建设,防止错误价值观泛滥传播,确保青年接触到的价值观内容是真实、有益的,也为青年价值观内容的规范传播和错误价值观传播的追责创造条件。第三,积极推动技术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环境和应用场景中,实现教育理念与智能技术有效结合。可以在技术研发、算法设计、信息筛选、推荐推送、数据回收等多个领域开展技术融合试点,通过实践验证后逐步推广。技术融合要注重教育理念的渗透表达,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更高效和更具影响力的价值观塑造与传播,在杂多信息集合中为主流价值观的弘扬设置场域空间,消除传播过程的信息

茧房和“回音室”等负面效应。

从传播层面来看,人工智能是不可或缺的革命性工具。要结合具体实际,建构起人工智能驱动下的青年价值观塑造体系,重视信息把关与内容审核,着力掌握网络议题设置权,从而增强网络世界中主流价值观的议程设置能力,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第一,主流媒体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到信息产出、内容推荐、用户体验设计等多个环节,形成系统而紧密的主流价值观主导体系。各环节要紧密衔接,强化互动协同,共同构建主流价值观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表达激发青年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提供更富吸引力的案例、更为生动易懂的解释、更多的互动体验,引导青年积极参与相关议题和主题的讨论。第二,从实践层面来看,专业工作队伍的作用日益凸显,他们是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者和引导者,对于塑造网络舆论环境、引导网络舆论方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应加强青年价值观人才梯队建设,提升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同时也应鼓励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者主动创新工作思维,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开拓青年价值观塑造和传播新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和推广开辟新的道路。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者也应全面了解人工智能的优势与风险,明晰智能技术在青年价值观塑造与传播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积极构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主流价值观治理体系。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者也要改变自上而下的传统引领方式,与青年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推动技术在青年价值观塑造中的正向作用发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用极大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4]人工智能以全面性、开放性特征进入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这一革命性变革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革命性变革,深度研判人工智能技术作用下青年价值观塑造的演变规律、理论图景及呈现方式,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的积极作用,通过利用算法进行“价值引导”,以青年群体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增强青年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参 考 文 献]

- [1] 费尔南多·伊弗雷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吴常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版,第6页。
- [2]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 <http://www.cesi.cn/images/editor/20180124/20180124135528742.pdf>
-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cnnic.cn/n4/2023/0828/c199-10830.html>
- [4] 《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载《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2019年第3期。
- [5] N. Bostrom.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5 - 10.
- [6] 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 [7] 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张福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页。
- [8] 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 [9] 安珊珊:《2020年中国社交媒体用户使用行为研究报告》,载《传媒》,2021年第14期。
- [10] 周若辉:《虚拟与现实——数字化时代人的生存方式》,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 [11] 杨 兵 卢国庆 曹树真 等:《在线学习系统数据可视化评价标准研究》,载《中国远程教育》,2017年第12期。
- [12] 杰弗里·斯蒂伯:《我们改变了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李 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 [13] Alain Gras, Pierre Musso (sous la direction de). Politique, Communication et Technologi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6, p.382.
- [14][25]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 黎 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9页。
- [15] 卢永欣:《语言维度下的意识形态分析》,载《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
- [16] 王欣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
-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 [18] 张爱军 李 圆:《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权力:逻辑、风险及规制》,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 [19]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1页。
- [20] 刘 波:《人工智能对现代政治的影响》,载《人民论坛》,2018年第2期。
- [21] 孙 亮:《“算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阐释》,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
- [22] 杰米·萨斯坎德:《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李大白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第229页。
- [23] 邓伯军:《人工智能的算法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5期。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8页。
- [26] 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 [27] 汪 康 吴学琴:《智能媒体时代青年价值观认同建构》,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
- [28] 王小芳 王 磊:《“技术利维坦”: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潜在风险与政府应对》,载《电子政务》,2019年第5期。
- [29] 张 磊 王建新:《从释放到赋权:人工智能嵌入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 [30] 龚莉红:《基于“信息茧房”理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 [31]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
- [32] 张爱军 李 圆:《人工智能时代后真相现象的消解、再塑及矫治》,载《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8期。
- [33] Michele Willson. Algorithms (and the) Everyda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7, (20).
- [34]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责任编辑:张 丹)